

高阳◎著

这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。高阳对历代皇朝兴废得失的根源，一直有独到的研究，对清代历史及清朝皇帝的行谊，尤其有深入而精辟的见解。而文笔之优美，论述之周密，更是精彩绝伦。

清朝的 白王帝



五
日落西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K827-49

高阳◎著

清朝的 皇帝

五

日落西山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朝的皇帝. 5/高阳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321-4936-0

I. ①清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5763 号

©风云时代出版公司

* 本书由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授权,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特约策划:王轶华

责任编辑:夏 宁

封面设计:高静芳

清朝的皇帝. 5

高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www. slcm. com

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7.25 字数 200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36-0/I · 3868 定价:32.00 元

目录



穆宗——同治皇帝

1

德宗——光绪皇帝

31

后记

267

穆宗——同治皇帝





同光号称“中兴”；而“明治维新”亦在此时，何以“中兴”只得一时，他人的“维新”却建立了坚实的富强之基？鉴古知新，且暂抛下“天子出天花”，谈一谈由倭寇而为藩阀；藩阀而为“皇军”，近代祸我中华之由。

按：德川幕府“奉还大政”，始于庆应年间，但“倒幕派”主力萨摩（福岡）、长州（山口，在广岛附近）两强藩，却有变成德川第二之势。

所谓“王政复古”，将成空话；于是“文治派”思以议会牵制强藩；陈水逢著《日本政党史》云：

当时推动王政复古的力量，一为朝廷中以岩仓具视为中心的急进派公卿；一为共同联合倒幕的萨、长、土，三藩以及尊王派的肥、尾、艺、越各藩志士。在国是会议中，这些势力分成保守与急进两大派系，一主文治，一主武治，且以各藩为背景的藩阀，互相对立，争权夺利，情势颇为复杂。

是时全国早已平定，中央政府的组织，亦粗具规模，但各藩仍拥有版籍与武力，各自为政，对中央政府的政令法制，多阳奉阴违；封建

制度的色彩，仍极浓厚，朝廷未举统一之实，王政维新的大业未能贯彻。

文治派领袖木户孝允，目睹这种情形，认为要巩固中央政府基础，非削弱诸藩的势力不可，乃连络大久保利通，劝说萨、长、土、肥四强藩，向朝廷建议，奉还版籍。明治四年（一八七一年）七月十四日天皇命各藩知事入京，发表废藩置县的敕诏。于是使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日本国民置于均等的支配统制下，地方制度统一，朝廷全收土地兵马之权于中央，巩固政府基础，确立了阀族的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。至是数百年的封建制度遂告废绝。

明治天皇即位于公元一八六八年，即同治七年；明治四年为同治十年。在废藩置县的一年以前，文治派亟图谋求外援，于同治九年七月，遣外务大臣柳原前光、少臣花房义质等来华，与总署商立约通商；当时天津教案正处于紧张阶段，曾国藩则已在马新贻被刺后，奉旨回任两江；李鸿章甫行到任，无暇接见，所以柳原只在天津见到三口通商大臣成林。

其时洋务体制上，有一个对实际工作相当重要的改革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，归直隶总督经管，颁给钦差大臣关防，兼辖山东之东海关，奉天之牛庄关。直隶总督于春融开冻后，移驻天津。封河再还保定省城。岁以为常。并增设津海关道。

此为李鸿章自谓“早年科名、中年戎马”以后，“晚年洋务”的正式开始。同治十年五月受命为全权大臣，与日本在天津议约，以江苏臬司应宝时；署津海关道，总署章京领班出身的陈钦为帮办；对手则为日本的大藏卿伊达宗城；原来的柳原前光，变为伊达的副手。

九月间定议，计修好规条十八条；通商章程三十三款，并附两国海关



税则。条件较逊于中国与欧美所订的商约,因而日本政府颇为失望;伊达宗城亦因此丢官。但在中国政府,认为已作了相当让步。

印鸾章所编《清鉴纲目》记成约经过云:

先是日使柳原前光来中国,疆臣有以前明倭寇为辞,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,李鸿章奏驳之,谓“顺治迄嘉道年间,尝与日本通市,江浙设官,商额船每岁购铜百万斤。咸丰以后,苏浙闽商,往长崎贸易寄居者,络绎不绝。论者拒绝之请,于今昔时势,彼国事实,盖未深究。

今彼见泰西各国,与中土立约,彼亦援例而来,设拒之太甚,必因泰西介绍固请,自不如就此时推诚相与。彼使臣等来谒,每称欲与中国结好,协力对外,立言亦颇得体。既允立约在前,断难拒绝于后。”时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,亦上疏力争,其大致与鸿章折中言相同;且言“日本素称邻邦,非朝鲜、琉球、越南臣属之比。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,彼将谓厚滕薄薛,积疑生嫌。但约中不可载明,比照泰西各通例办理;尤不可载利益均沾等语。”

疏入。朝旨趣之。

按:其时日本政府的文治、武治两派,正起争议;“征韩论”业已发端。但不论文治、武治,发奋图强的目标是一致的;全力追求与欧美各国的地位相等的目标,亦是一致的,因此,伊达宗城携回一份与欧美不平等的条约,被认为是一种屈辱。

因此,日本于同治十一年二月,复派柳原前光与李鸿章交涉,要求依照《万国通例》改约。李鸿章的答复,颇为得体;确较一般洋务者为高明;他说:“万国公法,最忌失约,今两国于未换约之先,即议改约,旋允旋悔,

所谓‘全权立约’，岂非自相桎梏，贻笑他邦？”柳原大惭而退。

当然，这亦是李鸿章自尊其“全权”的立场；以后，李鸿章受命交涉已有成议，而朝廷意见不同时，李每以“不便失信于外人”为辞，占得上风，即肇端于此案例。

改约不成，终于正式订约。日本特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使，而李鸿章在天津“互换条规”时为同治十二年四月。而在此之前，台湾山胞惹事，终于引起日本对华的武装侵略。

事起于同治十年十一月，有一条琉球船遇台风飘到台湾，为山胞劫杀五十四人；十二年二月，又有日本小田县人四名，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按琉球早为中国的藩封，顺治入关以后，称臣一如明制；但又同时朝贡于日本。

因此，日本自以为应该提出交涉。当时总署大臣毛昶熙，态度强硬，他的答复是：“番民之杀琉民，已闻其事，害贵国之民，则我未闻之也。二岛俱我属土，属土之人相杀，裁次固在于我，我恤琉人，自有措置，何预贵国事，而烦为过问？”

这话理直气壮，但不能令人心服，因为日本人死了四个，确是事实。如果仅就此接受交涉及其要求，酌量赔偿，便可无事，而日本的武治派志不在此，特就琉民被害，提出质问，柳原前光与毛昶熙有如下的对话：

柳：贵国已知恤琉人，而不惩台番者何也？

毛：生番系化外之民，我政府未便穷治。

柳：生番害人，贵国舍而不治，然一民莫非赤子；赤子遇害而不问，安在为之父母？是以我邦将问罪岛人，使某先告之。



清朝的皇帝(五)

既然台琉皆为属土，则恤琉人而不惩台番，是中国的内政，不烦他国干预。这本是很容易应付的事，不幸的是毛昶熙说错了一句话，谓生番系“化外之民”，无异表示了放弃对生番的统治权。

日本武治派原就是想以此为借口，所以事先提出关于生番、熟番居住区域，如何划分的问题；毛昶熙这句话，恰好堕其彀中，因而柳原有那样明确强硬的表示。

交涉经年，日本准备妥当，终于在同治十三年三月出兵了，《清史记事本末》记：

以陆军少将西乡从道为都督，谷干城及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，率兵赴台。海军少佐福岛九成为厦门领事，兼管番事，别延美国人李先得参谋议，佣英美船为运输，而特命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为总理。时美公使镂斐迪，执局外中立之例，收还其船舶人民之为日本所佣役者，并令厦门领事捕李先得等；英公使巴夏礼亦言日本此举不合公法，中国必生异议。

于是内阁人士纷议，急遣人驰谕于重信，令止军行，且归京。重信告从道，从道不奉命，曰某当亲捣虏巢，毙而后已，万一清国生异议，朝廷目臣等为亡命流贼以覆之可也。

重信劝谕百端，从道不听，即夜下令发师。重信电闻，日廷大忧，再传内旨于长崎，从道愤然行。而厦门日领事九成，亦书告闽督李鹤年，谓今将起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，鹤年覆书，争生番为中国属地，请撤兵，随疏以闻，令葆楨巡阅台湾，调兵警备。

日本出兵台海，为武治派势力蠢动的鲜明迹象；亦为“征韩论”失败

后,谋求有所代替的结果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阴谋分子,便是奉派来华的副岛种臣;我何以说他是阴谋分子呢?因为他在中国是以伪善者的面目出现的;一切强硬交涉,都由柳原前光出面,他隐在幕后指挥。

梁嘉彬在《近代中日关系探源及两国外交使才举例》一文中,有颇为深入的分析。副岛受任外务卿之初,曾经在横滨截住一条秘鲁商船,解救了来自广东台山等地“猪仔”二百三十名;奉使来华,每向中国当道自炫此功;同时为了攻击文治派,也泄漏了若干日本政坛的秘密。加以他是日本的汉学家,汉诗汉文据说得苍浑古朴之致,因而中国官场认为他是“亲华派”。

实际上呢?且看梁嘉彬的叙述:

我们假如追究到他任外务卿任内,短短两年当中,便有不少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做出来。册封琉球,征讨台湾生番,“征韩论”都是他和二三“知己”的杰作。据“大隈伯(重信)昔日谭”,则更谓“征韩论的发起人,实即副岛种臣”。他对琉球的处心积虑,可参阅琉王尚泰近臣喜舍场朝贤(唐名向廷冀)所撰《琉球见闻录》。他的讨伐台湾生番计划,早已存在他用最高薪俸,延聘美国反华专家李光得(C. W. Le Gendre)为外务省顾问之时。……“征韩论”一般被认为是西乡隆盛的主张,其实蛛丝马迹,都可看出副岛在幕后推动。

明治六年十月(一八七三年、同治十二年),“征韩论”遭到从欧美考察返国的文治派右大臣岩仓具视等人的反对而失败,西乡下野,副岛也随之下台。嗣后在政场一蹶不振,失意之余,又反过来向中国多方讨好。日本人把副岛外交称做“无轨道外交”,很觉恰当。实际说起来,此人对日本是有丰功伟绩的。



副岛种臣对日本的丰功伟绩,是制造了一个日本侵华的有效模式,这个模式是武力与言词两种恫吓交互为用;并充分利用中国官员重情面的弱点,勾结第三国外交人员“唱双簧”,以故在日本得有软硬兼施之便;而在中国则有左右为难之苦。

按:西乡从道,即力主“征韩论”的西乡隆盛之弟,即此一端,可以想见其间的渊源。至于日军侵台,进攻番社,战事并不顺利;因而日本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,一是由太政大臣三条实美,通知陆海卿,准备对华作战,陆军卿山县有朋提出“外征之策”,这是对华的恫吓;一是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,来华交涉,此方是本意所在。

当时受命主持防台军务者,为船政大臣沈葆楨,渡海在安平登陆,亲自指挥,并奉准向英商汇丰银行借银二百万两,充作军费,准备颇为周到。因此,总署对大久保要求赔偿的态度颇为强硬,文祥公开表示:“一钱不给。”大久保色厉内荏,勾结英使威妥玛,硬作调人,于九月廿二日订约三条:

- 一、日本国此次所办,原为保民义举,清国不指以为不是。
- 二、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,清国许给以抚恤银十万两,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、建房等件,清国愿留自用,先行议定筹补银四十万两。
- 三、所有此事,两国一切往来公文,彼此撤回注销,作为罢论。

第三条是日本为了防备他国;尤其是美国为中国抱不平,出面干涉之故。大错在第一条承认日本出兵为“保民”;无异承认日本对琉球有宗主权。如果坚持不屈,则被困日军,方为疟疾侵袭,死亡相继;山胞与清军内外夹击,可获全胜。倘若结局是如此,则日本此次出兵耗军费六百余万日圆;战死虽仅十二人,病死者五百六十一人,损失惨重,武治派必将备受指摘,或者一蹶不振,则不独中国,恐怕日本的历史亦要改写了。

当时对敌情虚实看得很清楚，沈葆楨疏言：

倭备虽增，倭情渐怯，虚声恫喝，冀我迁就求和。倘入彀中，彼必得步进步；我但厚集兵力，无隙可乘，自必帖耳而去。请坚持定见，力为拒却。

同时，沈又致书李鸿章云：

利通之来，其中情窘急可想。然必故示整暇，不肯遽就我范围，是欲速之意在彼。我既以逸待劳，以至待客，自不必急于行成。

李鸿章据以入告，廷议咸表同意。既然如此，何以又有许订约三条，承认日本出兵为“保民”的愤愤之举？一言以蔽之，小皇帝荒唐不争气，恭王以下，不独心力交瘁；更怕紧要关头，譬如大举用兵时，小皇帝负气捣乱，那是件不得了的事，因而将就了结，铸成大错。

穆宗之病，起于十月下旬，至月底，有上谕，命李鸿藻代批章奏。旋由惇亲王等议定，除汉字以外，清字章奏由恭王代批。以臣下而摄君权，自然不妥；因而在十一月初十，颁一道明发上谕：

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，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，静心调摄，朕思万几至重，何敢稍耽安逸，惟朕躬见在尚难耐劳，自应俯从所请，但恐诸事无所禀承，深虞旷误，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，俯念朕躬，正资调养，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，呈请披览裁定，仰荷慈怀曲体俯允，权宜办理，朕心实深感幸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。



清朝的皇帝(五)

此为慈禧太后第二次垂帘。至于穆宗之病为出痘，于十一月初二日证实；翁同龢是日记：

辰初到东华门，闻传蟒袍补褂，圣躬有天花之喜，余等入至内务府大臣所坐处托案上人请安，道天喜。易衣花衣，以红绢悬于当胸，辰正二刻请脉。已初见御医李德立庄守和方用凉润之品，昨日治疹，申刻始定天花也。遂出，预备如意三柄明日呈递，闻此十二日中折用黄面红里。

清宫在传统上有“天花恐惧症”；此为我杜撰的名词，起因于世祖出痘而崩，以故谈虎色变，每逢万寿、年终、外藩入觐，凡未出痘者，一概禁止进京，防范极严。穆宗出痘，宫中大为紧张；所谓“天花之喜”，是预期必能顺利出痘，而一出了痘，即等于跳出鬼门关，岂非大喜事？是故照万寿的规矩，“易衣花衣”。所谓“花衣”即蟒袍，“前三后四”包括正日在内共七天，称为“花衣期”。穆宗出痘的花衣期定为十二日者，以预计十二日可度过危险期，得庆更生。

显然，御医的估计，过于乐观；如果十二日可报平安，则不必于初十日降旨请两两宫垂帘。

《翁同龢日记》于十二日记：

午间从正大光明殿接娘娘，走后左门一带，奉于养心殿。王贝勒及内务府诸臣，皆有执事，宫内皆挂红联（如春联而红）。

按：所谓“娘娘”者即痘神。翁同龢于十四日又记：

连日皆以祈祷为事。闻内务府已行文礼部，诸天众圣，皆加封号，乾清门上陈设龙船九副（纸作），大清门外砌洗池，方径十丈许也。

其时病势已开始恶化；因有并发症出现；据吴相湘在《晚清宫廷与人物》中记述：

宫中虽然用力于祈祷神祇采取一些迷信措施，但医药仍是每日照常的，主治的是太医院的侍御医李德立、庄守和两人。当同治帝出痘的第三天，这两位太医处方是用蚯蚓作药引，颇使时人奇怪，因此翌日处方就无蚯蚓了。

是月初九日即帝染痘后的第九日，群臣入见帝“起坐气色皆盛，头面皆灌浆饱满，声音有力”，“且举臂以示颗粒极足”，使群臣“不胜喜跃而退”。但其后数日结痂间有抓破，致流血少寐，而御医处方竟用桂枝、青皮，又用三仙，使每日遵旨看药方的大臣们“不识其故”。

十三日御医说“气血不足”，药方除桂枝外又加鹿茸。十四日早处方仍用鹿茸，用生耆熟地加麦冬。十五日处方去桂枝，全用凉血发散药，是这样的凉热杂投，到二十日，痘痂虽渐落，而帝腰间肿疼作痛流脓，项脖臂膝皆有溃烂，李庄两位御医于此遂“意甚为难”了，盖这些溃烂处，“根盘甚大，渐流向脊，外溃则口甚大，内溃则不堪言状。”

病势如此，仍当作“天花之喜”的喜事来办，大沛恩纶；日连下数道上谕，第一道是崇上两宫太后徽号；第二道以下用“奉懿旨”的名义，封慧妃为皇贵妃、瑜嫔等晋位为妃；第三道加恩内廷行走人员，自惇王以下，或赏食双俸；或赏食进一级俸，如醇王之子，即后来继统的载湉，年方四岁，已



清朝的皇帝(五)

赏头品顶戴，此时又赏食辅国公俸。

此外军机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弘德殿行走的师傅、南书房、上书房翰林等，或赏双眼花翎，或加宫衔，或优先补缺。亦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均加两级；京师各营兵丁，赏钱粮半个月。第四道上谕则为减刑恤狱。

凡此皆为两宫太后“做好事”，以期化戾气为祥和，上迓天庥；不过，除了减刑恤狱，可能有人受益；以及士兵赏半月钱粮是实惠以外，其余只是一场空欢喜，穆宗崩后，上开恩典，便即撤销了。

在恩旨中，有王庆祺的名字，他的本职是翰林院侍讲，以从五品而“赏加二品顶戴”，倘或穆宗无恙，则“二品”补实，即为内阁学士；翰林熬到阁学，不出纰漏，则内转侍郎，外放巡抚，必可大用。可惜此人福薄，其兴也暴，其败也速；兹据前引王庆祺遇穆宗微行事，续引下文：

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，知遇上也。不数日上谕下，二人皆不次晋秩，某部郎以枉道为耻；辞不拜；太史则数迁至侍郎，宏德殿行走，所以蛊惑上者无所不至。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，所谓出痘者，医官饰词也。及薨，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：“宏德殿，宣德楼，德业无疆，且喜词人工词曲；进春方，献春册，春光有限，可怜天子出天花。”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，永不叙用。

所谓某部郎，其实为编修张英麟，字振卿，山东历城人。《十朝诗乘》记：

王庆祺之入直讲幄，张振卿都宪师，以编修同被恩命；在直未久，不善庆祺所为，即乞养归。庆祺膺春日隆，华秩崇衔，舆论薄之。穆

宗升遐后，坐典试匿丧为台谏劾罢，实借辞也。孙琴西太仆读吴柳棠遗疏，感赋有云：“玉陛金铺散晓光，钧天一醉梦难辰，谁知十部龟兹外，别有人间万宝常。”即刺庆祺而作。

按：张英麟同治四年翰林，曾典福建乡试，官至左都御史，光绪二十九年会试，借闱河南，张为四总裁之一。

《十朝诗乘》作者郭则澐，即于是科获隽，故称张为“都宪师”。惟谓孙琴西诗，为刺王庆祺而作，恐有疑问。若谓以万宝常拟王庆祺，则尤不类。万宝常，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皆有传，中华版《中外人名辞典》撮叙其人云：

隋人，齐时坐父罪，被配为乐户，因而妙达钟律，工八音，造玉磬以献于齐。开皇初，沛国公郑译定乐成，召问，宝常：“此亡国之音，哀怨浮散，非正雅之声。”极言其不可。常奉诏造诸乐器，应手成曲，无所凝滞，见者无不嗟异，其声雅淡，不为时人所好。家贫，无子，其妻以其卧疾，遂窃资物以逃，宝常竟饿死，将死，取所著书焚之，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行世。

如谓以万宝常拟吴可读，则有几分近似，此为另一重公案，后文将会谈到，兹仍接叙穆宗病势。

穆宗之疾，大致至十一月廿五以后，已成不治之势。翁同龢日记：

十一月廿七日：方按云：脓汁虽见稠，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余，恐伤元气云。……总管张监云，起坐时少，流汁极多，殊萎顿也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：至奏事处，适太医李德立、庄守和在彼，询以两